

公费农科生：编制光环下的利与弊

■本报见习记者 刘如楠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下,继公费师范生、医学生之后,公费(定向)农科生正逐渐走进大众视野。而来自部分省区的相关数据显示,农学类本科生就业率近年来大幅提升。但趋势向好的同时,如何规避定向限制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仍是政策设计者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7月,在这个大多数毕业生或准毕业生都在为工作、读研、留学等忙碌奔波的时候,浙江农林大学农学专业2021届的本科毕业生刘国荣却显得很“清闲”:4年前入学时,他的工作就已定好——到浙江温州文成县所辖的乡镇农业部门去。

像刘国荣这样的公费定向农科生,浙江省自2012年起已培养了962人,其中近600人走上了工作岗位。近年来,山东、山西等省陆续实行公费农科生招生政策。这是继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后,又一个“免学费、包分配、有编制”的招生类型。

这类学生通常按照提前批次录取,由省级财政承担其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毕业后,回到相应地区的农技推广机构工作,确保有编有岗,服务年限一般为5年,因个人原因违约需承担相应责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曾多次呼吁扩大公费农科生的政策覆盖面。他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要靠人才和科技的支撑。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基层农业人员需要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综合掌握农业、管理、科技知识。当前,基层农业人员存在老龄化、专业技术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土专家”“田秀才”。

反差:报考就业“冰火两重天”

没有视频中精心拍摄与剪辑的画面,也缺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在山东省一个普通的村子里,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可能是汽车驶过扬起的一片黄土,是烈日下在玉米地里被炙烤的皮肤。

对许多农科生而言,好不容易考了出去,上大学又回到原点,这令他们和家人们都无法接受。因此,基层农科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的现象非常突出。“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体制改革,受传统观念、产业地位、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农科专业人才招聘和留用长期面临困境。”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朱军告诉记者。

以山东农业大学为例,受学科、地理位置等影响,与省内同等实力的高校相比,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平均低100分左右。

和长期以来形成了固有观念的民众不同,市场对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张宪省指出,“当

前不少大型企业都逐渐向农业领域布局,这就需要大批农业科技人才。”

“和报考形势截然不同,农科生的就业形势非常好,选择也很丰富。”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团委书记尹昌美说,近年来,每年到该校参加招聘的单位和企业都需要提前预定时间场地,学校经过筛选,根据当年毕业生人数,按照约10:1的比例提供岗位。“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位毕业生至少有10个岗位可选,其中不乏薪资待遇非常优厚的。”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本科毕业生中,就业率最高的是农学类专业,为92.63%。安徽省也是如此,据《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2019年该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0.39%,其中农学就业率最高,为92.01%。

需求:破解地方农科人才断档难题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同时也是水产品、果品、畜牧产品和蔬菜产品的主产区,山东省基层农科人才短缺的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乡村振兴的短板。

“各省、市、县、乡镇都设有农技推广机构。近年来,随着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这些机构被合并至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仍然需要技术人员从事相关工作。但是,现有人员老化、专业技能不足、推广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明显。”张宪省介绍。

为缓解这一局面,2018年起,山东农业大学等3所省属高校率先开始招收公费农科生。

实施过程中,首先由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主管部门根据编制及岗位空缺情况提出申请,经县级农业部门汇总后,公开招生计划和定向培养招生(招聘)公告,再由省招生考试院将名额协调分配至各个高校。拟录取后,报考生直接与其选择的县区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

与山东省仅为定向农科生免除学费、住宿费等不同,浙江省从2006年起就为所有本省户籍的本科、高职农科生免除费用。

“1998年,浙江省高校合并重组后,人才培养目标发生改变,服务地方经济的应用型人才缺乏,地方农科人才出现断档。”朱军说。

当前,浙江基层农技岗位人员缺口达2600余人,且未来5年每年约500人面临退休。

2012年,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了

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工作。朱军表示,“这是为了解决基层农业服务人员老龄化、青黄不接、专业失衡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优化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举措。”

与普通农科生相比,定向农科生除了学习专业课程外,还需要选修定向模块课程。浙江农林大学2018级园艺专业定向生周欣雨说,“像农业经济学、种子科学、演讲与口才、公文写作等课程我们都要学,要修10个学分以上,知识面相对更宽泛。”

同时,定向农科生实行“双导师”制,即聘任用人单位的技术人员作为校外导师,配合校内导师进行操作技能指导。毕业论文也是根据当地的农业实际情况提出并完成的。

这和山东农业大学的培养方式不谋而合。“定向培养的目的是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服务,他们不仅要向农民推广相关技术,还要宣讲政策、协调农产品加工、拓宽销售渠道等,这就涉及多方面的能力和知识,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尹昌美告诉《中国科学报》。

“定向培养使学生有了较强的基层服务意识。去年5月,因疫情封控需要,学生们都在家学习,有同学就提议搞‘线上科技智农活动’,牵头联系了当地的种粮大户、农民等,提前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邀请学院教授与他们线上沟通,面对面答疑解惑,效果非常好。”尹昌美说。

在实践方面,定向农科生需到未来就业单位完成学期实习,提前熟悉工作环境和内容。“虽然培养方案是针对农技推广而制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掌握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不是我们教农民种田,而是农民教我们种田。”已经在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了4年的浙江农林大学首批农技定向生周树杰说。

编制:最具吸引力的待遇

回想起3年前选择专业时,周欣雨至今都庆幸父母及时看到了台州市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定向招生公告。

“当时高考完比较迷茫,不知道今后要做什么。父母本身就在黄岩区基层乡镇工作,他们觉得毕业了不用找工作,直接入编到乡镇政府挺好的,还考虑到未来乡村发展会越来越越好,年轻人在农业方面可以很有作为,就建议我报定向到本区的农科专业。”她说。

入学初期,她对专业谈不上喜欢,即便从小在农村长大,她也从未真正了解过这片土地和生长其中的果木作物。

兴趣的产生源自专业实习。从大二开始,除了理论课程外,他们需要亲手种植果树、花卉、蔬菜,并进行嫁接、修剪、防虫等工作,还会到种植基地参观。“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以前看外公种桃树、梨树,只想摘果子,现在也可以帮他做一些事了。”她说。

和周欣雨及其家长有同样想法者不在少数。在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定向农科生附带的事业编制成了最大的吸引力。

即将升入大四的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唐瑾甚至有些后悔没有报定向农科生,“当时父母非常想让我报,但我不想被束缚,现在临近毕业,觉得省去找工作的麻烦,还有编制,挺好的”。

在记者对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98名学生的调查中,提及报考公费农科生的原因,约61.2%的学生选择了“毕业有编制”,选择“家长强烈推荐”和“个人兴趣爱好”的分别占22.5%、14.3%,只有2人选择了“可享受免费及补助”。

在浙江省,随着头几批“吃螃蟹的人”逐渐走上定向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关注到这一举措,把定向农科作为首选志愿。近年来,定向农科生的分数线也“水涨船高”。朱军介绍,“与普通农科相比,我校定向农科各专业的分数线平均高20~30分。”

相对“冷门”的农科专业正在升温,人们对农科的固有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就普通农科专业来说,前些年我们的分数线在500分左右,近两年已经涨到580~590分左右了,这缘于大家对农科认知的变化,当然也有学校发展提升等原因。”朱军说。

在招生工作中,尹昌美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近年来,咨询农科专业的学生和家長明显增多,城市县区的还多于农村地区的,他们可能消息更灵通,较早听说了公费农科生的政策。”

一项发表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论文显示,山东农业大学首批公费农科生中,城镇户籍学生约占43.6%,城镇农村生源比相对均衡。该校农学专业学生王志鹏便是其中的一员。虽然还没有真正深入农村,但她却对基层农技推广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到农村去走访、推广农业技术很有意思。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农民劳作,帮助他们增产增收,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枷锁:定向限制潜能发挥

公费定向农科生带来的改变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依靠编制吸引人才给农科“升温”的做法能否持续。

自公费农科生招生以来,山东农大的招生人数逐年上涨,到2020年已增至247人,可今年又缩减至150人,主要原因正是编制的减少。

张宪省说,“人社厅每年给各个县市下发的编制指标有限,这就限制了县市申报的定向名额,学校的招生规模自然要缩减。但同时,基层农业部门的缺口又比较大,二者还存在矛盾。”他认为,矛盾的解决需要农业农村厅、人社厅等多个部门统一协调。

张宪省表示,缩招对学校来说并非坏事。“近年来,随着学校整体的扩招,师资力量一直很紧张,在此情况下扩大定向生的培养规模,对学校来说压力较大。”

“公费农科生保持一定的规模更有益于人才的培养。虽然他们岗位基本明确,但不同县市的实际情况不同,对学生的需求也不同,我们正在考虑一对一定制培养方案。”张宪省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对基层农业发展来说,仅靠这些在编的农技推广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先进技术的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只有市场活跃起来,基层农业才能更好地发展。”他建议,公费定向农科生的培养要打破体制内循环,面向市场。(下转第8版)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最近各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校(院)长与专家们使用最多的网络流行语是“躺平”,批评最多的也是“躺平”。

专家与大学校(院)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大学毕业生一旦失去了进取精神,不仅自身在社会上难以立足,于国计民生亦产生消极影响。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古人虽不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的话语,但作为现代道德的“进取”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文化碰撞后的产物。近代思想家严复引入的进化论直接将“竞争”与“生存”联系在一起,小至个人,大到国家,如果不“竞争”就不能“生存”,所以“竞争”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成了一个社会变革的工具。

进化论直接催生的新道德中就有“进取”,近代新派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讲“进取”。梁启超1902~1906年陆续写就的《新民说》中,就有专章论述“进取”。“进取”不仅与“冒险”并置,还涉及“希望”“热忱”“智慧”和“胆力”。它们又都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道德”来提倡的。

今天,国内的著名专家和大学校(院)长们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的,他们不会忘记彼时流行的不改革开放中国论“被开除(地)球籍”的严译进化论的现代回音。这种“进取”氛围也塑造了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以此思维方式看待“躺平”,持批评态度是必然的。

理解“躺平”需要厘清与之相关的“内卷”的内涵。“内卷”不是不努力、不进取,而是方向感的失去,或者说“作”一些于社会发展无实际推动作用的形式上的“为”。简言之,就是虽然在努力进取,结果却不遂人愿。严复、梁启超没有想到,“竞争”“进取”的进化曲线不是一直上升,也会在内外卷曲,呈现停滞或倒退趋势。

反对“内卷”者其实是一种思维模式,他们都在担心可能导致的“不进取”。这一担心不无道理,“进取”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往往是社会的主流倾向。但是,如果把“内卷”的现象忽略了,讨论“进取”“躺平”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说,“进取”“竞争”之所以导致“内卷”,主要是人们把“进取”“竞争”片面理解成“生存竞争”,而一旦与“生存”相关联,“进取”“竞争”就天然地具有了排他性,并且难以对他施以同情。

在现实中,“进取”与“内卷”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一种是“进取”式“内卷”,就是不同无意义,都当成有意义的事来做;另一种是“内卷”式“进取”,就是明知没有意义,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也要装得很有意义的样子去做。二者的共性就是都在不停地“做”,“做”本身成了意义,结果或者影响则不在考虑之列。

如今的大学专业认证则是两种情况并存。在教育管理者看来,要保证专业质量就需要硬性的科学指标,所以必须制定指标、执行指标。于是,认证的条目变得事无巨细。而各大学为了争取教育资源,或为了不至于被认定为“躺平”,也在积极配合。但这些原本适用于教育培训机构的认证方法和条目运用到大学,不仅违背大学教育的基本常识,也在衍生新的“内卷”。

一门课程的教育意义本身是具有整体性的,很难条分缕析地肢解,它对每位学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而教育本身是百年工程,教育效果总是要慢慢释放,不可能“立等可取”。但按照专业认证标准的要求,教师在填写课程教学大纲时,必须明确若干与教育效果相关的“教学目标”,并且与毕业要求的某一指标点建立对应关系;考题中的每个知识点、每位同学的得分都要根据事先制定的对应关系评估所谓的“达成度”。

换言之,以“科学指标”讲课,教师每讲一个问题都不需要联想到是否符合学生的毕业要求,还要将此效果量化或直接表述出来。这种“标准化”的要求与“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传统和“人的教育”理念的差距不言自明。

不参与会被认定为“躺平”,积极参与又在实际上助长“内卷”,这个难题出之缺乏反思的无谓“进取”和排他式“竞争”。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出“道不同不相为谋”,当今的普通青年或大学生选择不参与,以保持自身的纯粹,也未必不具有合理性。

“躺平”是与“内卷”相对应的概念或行为方式。不能认识“内卷”的真正含义,不能发现和检讨“内卷”的负面影响,就难以理解“躺平”式选择。因此,找寻“躺平”的社会原因,改变“躺平”产生的社会环境,较之简单的批评,或许更有意义。

批评「躺平」、请先理解「内卷」

通识教育大家谈

通识教育应与课程思政共生发展

■夏文斌

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总体思路来看,将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情怀具有重要意义。通识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升级版,对于学生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把握学科知识大有益处,课程思政能够帮助学生明确专业知识的价值导向,明白所学的知识为何用。

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非常强调多学科知识与能力的融会贯通,都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提升,都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位置。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共生发展是高校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

在知识能力的融会贯通中把握两者的共生发展

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仅靠一门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打通学科壁垒,推进跨学科教学与实践。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都不偏重单一专业知识与技能,而是重视多学科知识与能力的融会贯通,体现出新时代对高等教育的新的要求。

通识教育起源于19世纪,针对的就是当时大学中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的问题,希望通过通识教育的新方式,培养学生多学科的知识与能力,帮助学生实现不同专业知识与能力的融会贯通。此后,许多国家推行并加强通



夏文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识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课程思政则以学生所修的所有课程为教学载体,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充分挖掘蕴含于所有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从而推进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将思政教育渗透并贯穿到所有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推进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协同共进的教育体系建设,可以加强跨专业和跨学科的融通,提升学生的多学科知识与能力,增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帮助学生获取融会贯通的全景知识体系,有助于学生开拓学科视野、优化知识结构、补齐知识短板、夯实

知识基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责任感。

课程思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改革全过程的一种“隐性教育”。实现课程思政与通识教育相融通,可以提升思政教育的实践广度和力度,增强通识教育的思想高度和情感深度,同时也可使课程思政获得更丰富的教学资源,提高课程思政的感染力、影响力和引领力。

在人文精神提升中把握两者的共生发展

不同于工厂制造机器,高校是要培养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人文情怀的人。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都是教育理念的变革,它们强调的都不是简单的专业教育和技能培养,而是指向了教育在情感、精神和价值层面的作用,强调的是对受教育者情感、精神和价值层面的培养。

课程思政强调课程教学的第一要务是立德树人。它的实施意味着所有课程都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所有课程的思想教育作用,使其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教学过程中融入情感、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教育。

如果说课程教学都具有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的功能,那么,通识教育与课程思政则特别强调教学过程的价值引领功